

第一章 江南续命

一、定都临安

许多人认为，赵构定都临安是个很坏的选择，南宋政府由此远离前线，成为一个偏安江南的小王朝。

今天的汉语工具书几乎一致认为，偏安，等同于“苟且偷安”，指封建王朝失去中原而苟安一方。显然，这个词充满强烈的贬斥意味。

且看南宋定都的过程。

靖康二年（1127）四月，攻破东京开封的金军掳掠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妃嫔及北宋宗室、大臣北归。五月，因出使河北幸免于难的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市）称帝，建立南宋，之后便匆匆南逃。

完颜宗弼，也就是评书《岳飞传》中那个有名的四太子金兀术领军渡过淮河、长江一路穷追赵构，一直追到东南海上，称“搜山检海”。只是，这些北方骁骑不长于江南水网地区及海上作战，终被南宋水军所败。加之，岳飞收复建康，吴玠、吴玠兄弟在和尚原击退川陕方面金军，南宋的防御又建立了起来。

赵构在应天府时，开封留守宗泽上章二十多次，力主他北上还都，报家国之仇。但赵构被金人吓破了胆，无还都之念。

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李纲提出，不要定都于一地，而是建三

都，以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为西都，襄阳（今湖北襄阳市）为南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市）为东都，这样，既不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建都，又可迷惑金人，免受攻击。这个理念没有被多数大臣接受，于是他又提出上、中、下三策，以定都长安为上策、襄阳次之、建康为下，认为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足以复中原而有西北。

李纲不久罢相，多数大臣倾向于定都江南。也有大臣主张定都长安、四川。后来，宋金在陕西激战，南宋军受挫，定都关中已不可行，入蜀难控江南，襄阳的位置过于突前，易遭金人攻击，这两个方案都被赵构否决。

赵构想来想去，决定定都江南。

定都江南仍面临多选一问题，是选在建康，还是选更靠南的杭州、平江（今江苏苏州市）、越州（今浙江绍兴市）呢？

南北朝时期，南方王朝均定都建康。李纲鉴于时局变化，转而赞成以建康为都。名将张浚也认为定都建康可北望中原，杭州偏在一隅，易于安逸，不足以号令北方。

赵构为什么会最终弃建康而选杭州呢？

赵构起初摇摆不定。

他逃至长江南岸镇江时，吏部尚书吕颐浩提出应先留建康，群臣附议时，大都主张皇帝坐镇前线。都统制王渊却提出“请幸杭州”，说如果金军自通州（今江苏南通市）渡江，先据姑苏（今江苏苏州市），那怎么办？“不如钱塘有重江之阻”。赵构听了他的话，建炎三年（1129）二月十三日逃至杭州。

半个月后，赵构又下诏巡幸江宁府（即建康），称江宁府“王气龙盘，地形绣错，据大江之险，兹为用武之邦”。

但之后的三月五日爆发“苗刘兵变”，王渊及宦官康履、曾泽等被杀。兵变平息后，赵构于四月二十日到达江宁府，改建康府。此时，宋金战事正紧，建康危若累卵，大臣们又纷纷主张暂都杭州，赵构升杭州为临安府，十月，逃至临安。此后至次年四月，又被金军追击，逃亡于越州、明州、温州等地，并航海避敌。

金军不久撤离，赵构驻蹕越州，升其为绍兴府。但，绍兴地处浙东一隅，漕运不便。数年后，刘光世部将郦琼率数万淮西兵投降伪齐，给南宋两淮防线造成巨大冲击，建康已不安全，促使赵构做出了最终决定。与建康相比，杭州更加靠南，可扩展对金军防御的纵深，更好发挥江南水网作用及南宋水军所长；杭州靠海，一旦遇警可上船出海躲避。绍兴八年（1138），赵构下诏定都临安，以城内凤凰山州治为基础，兴建皇城、宫殿，称“行在所”，意为皇帝临时的办公地点，以示不忘故都开封。

赵构之所以选择杭州，首先是军事形势所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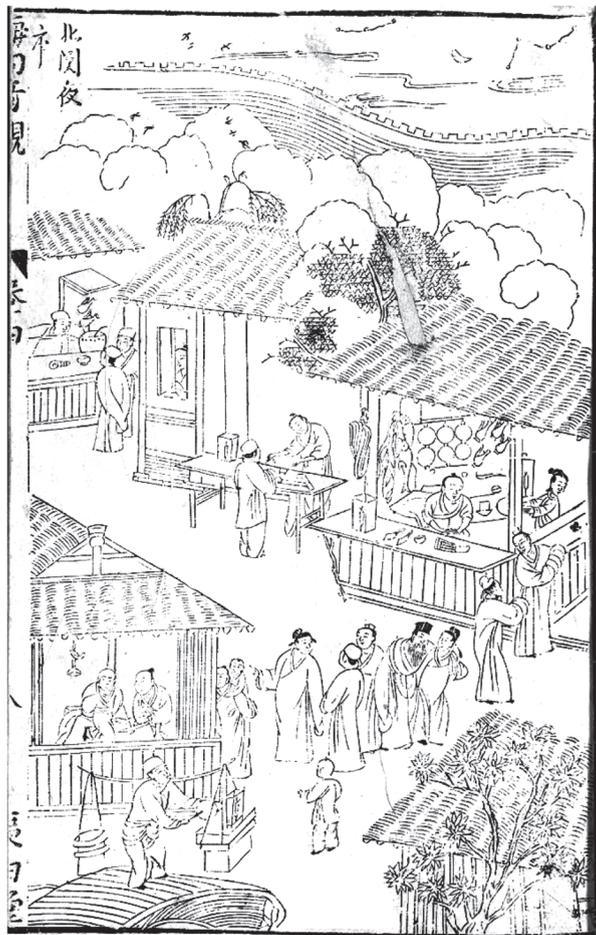
杭州的繁荣也是吸引赵构的重要原因。

杭州地处杭嘉湖平原，既靠海，又是大运河的起点，在北宋时便发展成为江南人口最多的州郡，商业兴盛，富甲一方。定都杭州，完全可以解决南宋政府的用度问题。

据《宋会要辑稿》载，熙宁十年（1077）之前，杭州每年商税十二万贯左右，当年商税高达十八万三千八百贯，而江宁府只有五万七千二百八十三贯，不及杭州的三分之一。

杭州的酒课额也超过四京——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名列第一。曾在杭州为官的苏轼在《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中盛赞说：“天下酒税之盛，未有如杭者也。”

王安石在《杭州呈胜之》诗中称：“游观须知此地佳，纷纷人物敌



明刻本《海内奇观》中的杭州“北关夜市”

京华”，将杭州与京师开封相提并论。

北宋真宗、仁宗朝大词人柳永写过一首描写杭州的词《望海潮·东南形胜》，南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说，这首词流播至金朝，其中的“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一句，令金主海陵王完颜亮艳羨无比，“遂起投鞭渡江之志”。完颜亮南侵是南宋高宗朝后期的事，距离柳永的时代已过去了一个半世纪，此说或有道听途说之嫌，但也从侧面印证了杭州的富庶繁荣。

定都杭州，亦是赵构基于历史因素的考虑。

杭州的繁荣，恰恰与赵宋王朝的兴起之间有着不同寻常的关联。

宋初，太祖赵匡胤令大将曹彬攻南唐，南唐主李煜不降，致书吴越国王钱俶求救，钱俶没有应援，反而遵太祖之命派军合击南唐，后来又主动降宋。为抵抗宋军和吴越军，李煜几乎将境内所有成年男子都赶上战场，其都金陵（即建康）被围近一年，城破之日，六朝古都毁于一旦。

吴越国的首都便是杭州，它在唐代时发展为东南名郡，但地位远逊于金陵、苏州、越州。而由于钱俶的明智选择，杭州免除兵燹，北宋时便有了“东南第一州”之誉。

金陵因宋兴而惨遭兵燹，杭州因宋兴而盛，平心而论，建康人的拥宋心理应该不及杭州百姓。赵构放弃建康而选择杭州，恐怕也顾忌到了这段历史。

假如赵构定都建康而不是临安，对于南宋的国家命运而言，是否更为有利？

历史无法假设。不过，相比于历史上定都建康的几个南方政权，比如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南明等，南宋一朝边患最重，军争最剧，但经济社会最繁荣，国家延续时间最久。

定都涉及国家根本，以赵构的经历和当时的军事形势，他选择杭州，最根本的考虑还是安全。一个在遭受毁灭性打击后重建的仍面临严重军事威胁的政权更加重视安全问题，再正常不过。定都临安，与所谓“偏安”江南并不能画等号。

二、谁是正统

偏安与否，不是个小事。

偏则不正，偏安与否，涉及中国古代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谁是正统？

正统是古代中国具有非常久远历史的一种政治观念。最早明确提出正统思想的是《春秋公羊传》。《春秋公羊传》相传是子夏的学生公羊高对孔子编撰的《春秋》进行的解读。

《春秋》开篇的第一句话是：“（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公羊传》的解读是：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意思是：“元年”是什么意思？是指国君即位的头一年。“春”是什么意思？是一年的开始。“王”指的是谁？指周文王。为什么先说王而后说正月，这是为了说明是周王朝的正月。为什么说周王朝的正月？是为了“大一统”。

“大一统”中的“大”，意为推崇、尊重；“一统”意为“正统”，所谓“大一统”，意即尊崇周天子的正统地位。

尊崇周天子的正统地位，带有整齐、看齐的含义，“大一统”逐渐形成今天我们所理解的“统一”内涵，包括统一思想文化，统一国家制度规范，统一国家疆域，等等。

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正统观亦有所不同，相关学者的解释也存在诸多分歧，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还是一个：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一般认为，北宋一朝是中国正统论思想发展的关键时期，此前，实际的正统之争大于理论上的讨论，进入北宋后，由于与北方、西北少数民族陷入旷日持久的纷争，并且处于下风，国家统一遥遥无期，以石介的《中国论》、欧阳修的《正统论》等为代表，士大夫们才对正统观做正式讨论。讨论的结果，自然是肯定北宋是正统。

赵构自认继承了赵宋血胤，南宋建立后不断有北方汉人南归，宋廷给这些人取了个统称，名为“归正人”，意为投归正统之人。

但南宋失掉了天下一统地位，同时面临社稷沦亡的威胁，这给宋儒以很大震动。大儒朱熹以尊君父、崇正统、贵中国、贱夷狄为目的撰写《资治通鉴纲目》，认为“凡正统，谓周、秦、汉、晋、隋、唐”，其余均称不上正统。朱熹没有说北宋、南宋是不是正统，但批评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的说法，尊蜀而黜魏，不赞成将占据中原的曹魏说成是正统。这显然是为南宋争正统。

中国自古有华夷之辨，而华夷之辨很大程度就是正统之辨。在一般汉儒、汉人士大夫眼中，汉人统治中国是正统，少数民族统治中国不是正统。当然，少数民族政权并不买这个账。

辽朝起初看不起汉人王朝，以“蕃”自居，实行蕃汉两制，到第七任皇帝辽兴宗耶律宗真时自称北朝，称北宋为南朝。第八任皇帝辽道宗

耶律洪基作《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歌颂君臣团结及辽汉和好，还在朝堂上公开宣称“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表达出强烈的争正统意愿。

金朝与南宋一度为君臣之国，认为自己理所应当是正统。第三任皇帝金熙宗完颜亶即位前曾受学于汉人韩昉，“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有强烈的正统观念，曾说“四海之内，皆朕臣子，若分别待之，岂能致一？”并启动汉化。继任的海陵王完颜亮迁都传统汉地燕京，继续推行汉化，曾说：“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他兴兵侵宋，有一统天下的目的。其后的世宗、章宗在位的近五十年中，汉化运动基本完成，这时的金朝实际与中国传统王朝没有多大区别。

历史上，“胡”“汉”是两个对应的称谓。汉人称北方少数民族为“胡”。金章宗承安间进士、诗人史肃曾写过一首《哀王旦》的诗，缅怀在贞祐二年（1214）抗蒙战争中战死的金朝顺州守臣王旦，其中的第一句是“八月风高胡马壮，胡马弯弓向南望”，将蒙古人称作“胡”。蒙古人是“胡”，那金人是什么呢？若仔细想，这个问题还挺纠结。

金宣宗有个汉臣、翰林直学士赵秉文，《金史·赵秉文传》载，他曾上书朝廷，以唐代抗击安史乱军的颜真卿、张巡、许远为例，说书生知兵，要求去守残破之州，抗击蒙古军。金宣宗肯定赵秉文志向可嘉，但没有批准，说“然方今翰苑尤难其人，卿宿儒，当在左右”。从君臣的这段对话看，他们哪里认为金朝不是正统？

忽必烈建立元朝前就大用汉臣，其中著名的谋臣郝经打破华夷界限，提出“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也”的正统观，较好地解决了蒙古人统治中国的合法化问题，受到忽必烈称许。

但元朝纂修前朝历史时，遇到了问题。史臣无法就辽、金、宋哪个是正统达成共识，吵了六十年，直到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时才诏定各修一部，承认三朝都是正统，《辽史》《金史》《宋史》很快就修成了。

到清朝时，问题又出来了。清朝自认代明复仇，灭了李自成，是正统。而明朝以元、宋为正统，清人若上溯也以宋朝为正统的话，就否定了自己的祖宗之国金朝。朱元璋祭祀历代帝王，把元世祖忽必烈加了进去，但不列辽、金之主。顺治、康熙祭祀历代帝王时，加入了明太祖朱元璋，同时增加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金世宗完颜雍以及元太祖成吉思汗，以宣示少数民族统治的正当性。

乾隆皇帝时，国家大局已定，为超越华夷之分，消除汉人对清政府的对立情绪，他多次与四库馆臣谈及宋辽金的正统问题，不断下谕旨辨析什么是正统，认为顺治、康熙时增加祭祀夷狄之君属不当之举，南宋虽对金称侄，仍是正统，明确说：“夫辽、金虽称帝，究属偏安。”

乾隆说南宋是正统，说辽朝尤其是占据中原的金朝为偏安，这听上去颇有脑筋大转弯的感觉。他的这个说法固然未被后世普遍认可，但也提示我们，一说到南宋就斥之“偏安”一隅，其实有问题。

而一旦人们形成所谓南宋“偏安”的成见，便免不了会生出许多似是而非的观念。

比如，许多人认为，辛弃疾写《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是借古非今，批评南宋偏安。而从辛弃疾写这首词时所处的时代背景看，情况却并非如此。他那时刚刚当上军事重镇江的知府，执政的韩侂胄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北伐。

再如，“南宋四大家”之一的马远通常只画一角或半边景物，他的画因此被称为“残山剩水”。过去流行的说法是，这是讽刺南宋的半壁河山和懦弱无能。现在，更多人认为，这只是马远个人追求的一种艺术风格，与政治关系不大。